

历史的壮歌

——读铁路作家孙贻荪新作《回望“第一路”》

□ 苗 勇

有些历史不能遗忘，有种精神必须传承。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有太多的精神需要挖掘，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讲述。作为当年铁路建设的全程参与者——现已93岁高龄的作家孙贻荪用洋洋洒洒近20万字向我们讲述了那段波澜壮阔、感人至深的往事。这既是一位亲历者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一座精神丰碑的当代重构，使人感动，给人启迪。用孙贻荪自己的话说“这不是我的自传，是13万筑路者的集体记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我们沿着这些文字铺就的铁轨回溯，那些即将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正化作永不褪色的星光，在薪火相传中照亮着新时代的征程。

用细节见证时代，战天斗地的激情在这里燃烧。细节是文艺作品的灵魂。作者特别擅长细节的描写和运用。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路”，参建人数超过13万，本身就是一个浩大工程和宏大史诗。但作品却没有空泛的宏大叙事，而是从军工第一总队参谋、西南铁路工程总队参谋这个微观视角切入，在细节中彰显出特殊年代军民战天斗地的火热激情，将精神蕴含于细节之中，从而达到一滴水见大海的境界。

时至今日，当我们看着路不拾遗的井然秩序和随处可见的高楼林立，已很难想象当时情形。作者用“战士们扛着武器、挑着箩筐

奔赴工地”，“仰起头望高处，战士们身轻如燕飞檐走壁；低头看地上，钢枪闪闪发亮。枪口挨枪口斜立在地上，像一把撑开的钢伞，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些军队筑路时“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小细节，呈现出了一幅特别场景。作品用细节彰显了军民战天斗地的火热激情。工地上，战士们打着火把出工，把每天的工作当作一场战斗，不完成坚持不下战场，许多战士虎口震出血，却没有人皱眉，更不说退下；享受师级退休待遇的胡老退而不休，主动申请到工地工作，哪怕给部队看大门都行；在生产与运转铁轨时，建设铁路从上海交大抽调来的驻厂代表以修成渝铁路为荣，说是一生的荣幸；轧钢厂的工人废寝忘食不计报酬；铺轨大队长为了安全运输铁轨，特意拜当地板车“老把式”为师开展大练兵，自己身先士卒前头拉“中杠”……这些细节，织就了成渝铁路的经纬，无不展现出人们积极投身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火热激情和澎湃热情。我想，也正是这种激情和精神，才引领中华民族在70多年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用本真彰显精神，革命的乐观主义在这里绽放。作为非虚构，该部作品也具有浓厚的“孙氏印记”，用回忆的方式叙述了作者参与修建成渝铁路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是一本成渝建设者的集体回忆，在“本真”叙事中展现了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

建设者们披星戴月，不论是行军还是在工地上，所有人的衣衫湿了干、又干了湿，但却没人说半点和苦和累。出征喝壮行酒是中国的传统。开工典礼当晚，军区后勤杀猪会餐为部队壮行时，给每人发了二两白酒算是特殊待遇，很多战士舍不得喝，用鼻子闻了闻，夸张的咂咂嘴，将酒倒进军用水壶后拧上盖子再用鼻子闻一闻看看是否“走气”。

川渝地形复杂，自古就有“蜀道难于上青天”之说。建设成渝铁路时，没有大型机械化设备、施工设施极为简陋、路料运力极为匮乏，全靠肩挑背磨手挖，从战争中走来的部队，很多战友连火车都没有坐过，更不知铁轨为何物，听说要铺轨时，全都是兴奋不已，争先恐后想为铺轨作贡献，哪怕打个下手也光荣，还说到老回忆这段往事时“也好痒着胡子对子孙说，修成渝铁路好多人抬着钢轨喊号子‘可威风可威风’”。多好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啊，他们也许并不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但人人却都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古训，也让人倍感新中国发展的不易，展现了独特的年代印记，也让该书具有了独特的史料价值和精神传承。

用群像塑造时代风貌，伟大的奉献精神在这里彰显。成渝铁路是新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揭开了中国铁

路建设的序幕。作品以成渝铁路建设推进时间为轴，沿着开工动员到通车竣工这条时间线，将叙事如铺铁轨般徐徐拉开，人物也粉墨登场，并由此塑造了从军人到民工、从将军到士兵再到普通群众等系列鲜活的人物群像。作家在塑造人物时，侧重于事件描写，用人物推动事件，用事件展现伟大的奉献精神。

作者身为参谋，自身也参加建设，但在行文中却并没有特意彰显，即便是在枪林弹雨之中穿梭面临生死考验，也描写得风轻云淡。我想，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精神的彰显。军人一心作贡献。战士们悄悄打着火把上工地加夜班，团长只得安排警卫排在路上布岗哨进行拦阻。民工一心只想作贡献。夏日铺铁轨时，即便是汗水落在铁轨上立马化为青烟，太阳下的铁轨能点燃香烟，但工人们却依然在辛勤劳作，没有半点退缩。普通群众想着作贡献，那位上了年龄的婆婆坐着鸡公车，为了修路，将当姑娘学做针线时就开始一年做一双、准备当“传家宝”的鞋垫无偿赠送给解放军。很多群众，甚至将“寿木”无偿捐作枕木……这样事例还有很多很多，不甚枚举。

精神是历史的财富，也是未来的灯塔。“铁轨延伸处，皆是丰碑。”感谢孙老的《回望“第一路”》，让我们再次重温了那段历史，让我们沐着那些战天斗地的激情和精神，锚定时代航船，迎着朝阳、沿着铁轨，踏步向前。

故去的回声

——评杜阳林长篇小说《立秋》

□ 徐清松

我与杜阳林的相识，是通过川媒知名文化记者何建。那时，何建围绕《惊蛰》的故事内容与杜阳林的人生经历进行了事无巨细的采访，杜阳林沉稳、低调的形象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打破了我脑海中“成功人士”傲慢的固有偏见。就这样，我记住了“凌云青”这个链接《惊蛰》与《立秋》的主人公名字，也从中间窥到作者的精神自传在小说中的投射，以及杜阳林意识形态的自我观照。

在《惊蛰》中，凌云青从小失去父亲，兄弟姊妹众多，而成为寡妇的母亲徐秀英备受村人的欺凌，童年的凌云青就是在遭受身体伤害和精神凌辱的双重压力下，生成了挣扎求生、艰难求活的内驱力，也养成了他秉性隐忍、坚韧不拔的高贵品格。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凌云青绝不屈服命运的形象站立起来，成为激励中小学生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小说结尾，凌云青考入了西北大学，实现了个体命运艰难又华丽的转身。这期间，无不浸润着杜阳林精神意志的自我观照。

而顺势而来的《立秋》赓续了这种意志和观照精神。作者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复杂广阔的海商沉浮，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以及在内外冲突中挣扎存活的现实写照。少年凌云青已经蜕变成一个温和

而坚定，宽厚而悲悯的中年人。主人公与同事宋桥从媒体辞职以后，合伙创办了“凌阳轩川菜馆”。“到了分道扬镳这一刻，宋桥第一次清晰地承认一个事实，凌云青是理想主义者，而他，是现实主义者。”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点出了凌云青这个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的根源。现实生活中的杜阳林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化身。纵观《惊蛰》与《立秋》，已然消隐的时代特征最能够唤醒中年人的记忆，这种时空的延续和画面的重现，有如故去的回声，在我们的耳畔不停闪回。

省报记者凌云青面对从老家来的岳红花，以德报怨地帮助了这个曾经欺凌自己母亲的同村人，去派出所协调通融岳红花犯法子孙二龙的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杜阳林以细腻又生动的笔触，刻画了两个人物的矛盾心理和心态变化，将主人公心底深处的善意呈现出来，从而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在经营川菜馆的过程中，无论是小到员工邓玉婵的提拔升迁，还是大到收购经营了多年的国营老字号利民饭店，乃至小说最后在锦南市拿地修建餐饮学校，凌云青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普通人，为了普通人的生存、发展，处处体现出他的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

在塑造主人公凌云青、宋桥人物形象的时候，杜阳林通过扎实的书写，让冲突的双方自身进行反思和思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并为二人最终分道扬镳提供了情理上的支撑。可以说，“凌阳轩”川菜馆是一个舞台，通过这个窗口，读者能够看到21世纪初成都民营企业的曲折多变的成长过程和沉浮不定的个体命运。杜阳林以从容不迫的叙述，为我们截取了这一时期社会特征的横剖面。

就人物塑造来说，小说通过多方面展示，着力刻画宋桥的“现实性”，从而来映衬“理想型”的凌云青，通过他们对人对事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来表现人物命运，也为二人分家，宋桥另起炉灶创办“宋园”餐馆，并最终因为自己的不择手段惹上“道上的人”继而生命受到威胁做出铺垫。除此之外，宋桥的舅舅冯金洲，以及后来成为舅妈的邓玉婵的人物形象，也在“凌阳轩”川菜馆风雨浮沉中充分展示出来。经营餐馆自然少不了大厨和服务员，在小说开头部分，从“蜀我香”川菜馆跳槽过来的服务员邓玉婵就成为俩人创业史上的元老级人物，这也让她后来成为领班，成为客服经理显得合情合理。邓玉婵积极上进，对人生走

向有着明确的规划，她在日常工作之余，还喜欢阅读，并参加成人自考，为自己的未来考量。在处理自己和利民饭店过来的资深服务员曹美娟矛盾的时候，她聪慧过人，胆识过人，最终采用怀柔政策征服了曹美娟这个“刺头”。而大厨冯金洲也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小人物，这个在乡村红白喜事上掌勺的中年汉子，师傅是从宫里御膳房出来的太监，从而学到了川菜精髓。冯金洲大大咧咧，由于经常在后厨抽烟，凌云青多次警告过他，还请专人制作了醒目的“制度墙”……但是在制作招牌菜，不遗余力研发川菜上，他都表现出一个大厨的专业和敬业，甚至当外甥宋桥与凌云青分道扬镳以后，他和妻子邓玉婵坚持留在了“凌阳轩”川菜馆。

当然还有罗小虎、凌云青的大哥凌云鸿、妻子曾黎、初恋韩细君等等，杜阳林以细致的笔触将这些人物形象从芸芸众生中打捞出来，围绕着一个川菜馆加以打量和表现，从而展现出一幕幕生动的众生相。然而，小说的不足之处也由此显现出来——作为一部20万字体量的长篇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似乎都太“正”了，如此，人物的矛盾冲突就被弱化，故事情节变得比较平淡。

作家钟正林，自2006年在《北京文学》发表短篇小说《斗地主》以来，二十年间，持续躬耕于乡村小说之沃土，已在《钟山》《当代》《红岩》《广州文艺》等发表了50余部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有评论家认为，“钟正林以他执拗的川西方言和对乡土人物执着的朴素刻画，成就了新乡土小说一种特别的美。”（贺绍俊《河雾成就一种特别的美》）。长篇新作《大堰口》（原载《中国作家》2023年下半年长篇小说专号），是继长篇小说《山命》《水要说话》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以川西丘陵凯江河畔大堰口村为故事发生为原点，在唐代诗人王维与玉真公主留下的一棵“千年红豆树”的感召下，掀起了一股乡村振兴的热浪。文本采用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视角，在语调、情绪、价值观念的变更中，重塑新的话语结构，不断扩展其文本的内涵与外延，词旨真笃。

钟正林善于从异变的乡土中把握农民、农村、农业的沿革脉搏，亦善于在乡土问题场域追问那些易被忽视的隐痛症候，正如其在创作谈中所言：“小说要回归到它正本清源的位置上，凸显它的艺术本真和人文高度，需要许多隐忍的坚守。”笔者以为，《大堰口》中，钟正林正是在农村变革视域下，把一种大势凝结在一方小小村落的精微细刻钟，让读者读到了这“三个维度”的灵性生长。

其一是农民的出走与留守。钟正林是一位善于从真人、真事中攫取素材点，继而生发其艺术冲动的成熟创作者。他一直致力于将文字与现实相耦合，从而形成独特的思维特质与人物营构范式。《大堰口》中所出现的三种主要人物，恰恰代表了农村变革大潮下的三种典型“乡土农民形象”。以龙庆阳、汪小萌为代表的“乡村知识分子”；以肖老、龙庆珠等为代表的“在乡农民”；以肖四娃、陈姗姗为代表的“流动农民”。如费孝通所说，那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龙庆阳与肖四娃分别代表了被吹向不同境地的“种子”，而这两粒种子又在乡土文化的泛化过程中，因为“在乡农民”的诉求旨归而选择了有意识地妥协。

钟正林的农民、矿工、编辑经历，让他谢绝蹈循精英文学创作之常规，他将自身置身于乡土与农民的苑囿之内，积极主动参与到农民形象的自觉体认过程中，作生活的镜像融汇，言之凿凿，确可信据。

随着城市的持续膨胀增殖与不断新变，那些依附在土地之上的人不可避免走向了两个维度的流浪——“身体流浪”与“精神流浪”。如肖四娃肖坤玉在那片“杉树林”里的失落与耻辱，漂泊他乡发达后，乡村振兴的大潮里又回归到这片凯江河湾的“杉树”林里荣耀绽放并相拥了当初的恋人龙二妹子。在《大堰口》中，既存在着对“身体流浪者”的“宽慰”，亦不乏对“精神流浪者”的“安抚”，如刘兰兰与黄雪雪亟待改变自己的身份，而不惜裙带攀附，或身体的付出，最终以悲情结局。高调的为“红豆树相亲节”，为单身汉讨老婆项目最终无法在凯江河与大堰口村生根，随着疫情的闹剧潦草收场。这些披上“振兴”外衣的所谓“宽慰”与“安抚”，该如何自处？如何在时代洪流中真正觅得流浪者的依存之所，如何安顿那些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生命，反而成为钟正林在文本内外最真挚的灵性赋义或文本隐喻。

其二是农村的凋敝与重建。关于川西农村的原始滋味，钟正林显然比任何“局外人”都看得清晰透彻，这也就是为什么钟正林能在守护其敦实情义的基础上，持续书写，永葆生机活力。因农村变革而遗失的“千年红豆树”，在重建口号的高扬下，回归大众视野。作为亟待被深挖的本土资源，“红豆树”无辜承担起重建凋敝农村之仔肩，也终于在喧嚣境域中，发出时代的阵痛。如文本中寻找一棵红豆树牵连出的市委叶书记与交通局长两兄弟等的

□ 萧劲廷

——读钟正林长篇小说《大堰口》有感

农村变革视域下的灵性思索

权利戏弄和人性写真。随着农村原始滋味的消逝，社会结构发生着异变，制度缺陷、权力约束、利益分配等疑难杂症，不断拓宽着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语义场，与此同时，乡村的“失真”也成了一个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繁华的大堰口村已经如“曾经繁花过眼的西贡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钟正林《写给一个人——大堰口创作谈》中国作家协会网2024年10月10日）。《大堰口》既表达了钟正林对农村传统文化的主动复活与重建，也呈现了其在活力注入旧体系时所潜藏着的隐忧。钟正林在文本与现实的互文交往中，通过质朴的宣泄和理性的节制，在极具张力的文本内外刻录出农村的凋敝与重建，以期普罗大众点燃良善的星火。

其三是农业的反噬与反哺。基于钟正林个人的生活体悟与真诚乡土经验，在诸如土地财产、生态环境、扶贫攻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中，他有他的创作路径，尤其在农业发展问题上，其沉郁的审美风格与朴实的价值理念一以贯之。大堰口村民无时无刻不企盼着相亲节的到来，随着外乡女眷进驻，情人公寓落成，招商引资之势方兴未艾，婚姻与家庭意识也如雨后春笋般徐徐萌发。然则，在一片众声喧哗之下，传统农业面对“现代农业”与“城市产业”之双重围困，如何在农村变革大潮中秉轴持钧，以一顺万，找到维系其价值的恒定量，业已成为钟正林《大堰口》文本中的深层意涵与精神象征。正如小说事件于终章在留下一套未知符号便戛然而止，“怔怔的我站在原地，仿佛这一切都在梦里。肖总怔怔的站在原地，举着耳边的手机，与熄了火的礼宾车，停在凉凉的山风中。”这股热潮之于农村究竟是反哺还是反噬，正是钟正林在土地系列问题的叙述中，时刻影射出的深沉忧虑，也是其二十余年里埋首深耕乡村小说所沉潜下的忧患意识“作祟”。

钟正林是一位思想深广的小说家，无论是长篇《山命》《水要说话》，还是中短篇《可恶的水泥》《鹰无泪》《纸花铃》，都在虚实实间映衬了土地与依附其上的人的问题。如李兴阳所言，乡土叙事不断拓展其叙事疆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整合所谓的“乡土经验”，从而导出思想和审美的多种选择。伴随着新世纪以来的乡村空心化与荒芜化，越来越多的“乡土小说”创作者与扎根现实背道而驰，乡土经验的缺失致使所谓的“乡土世界”成为沙上建塔，难以维系。反观钟正林，以其灵动的哲思和深厚的态度，调动自身的乡土记忆，反思这场变革的余波，既有意识地缝补农村异变之后的裂痕，也在见证与回溯中主动参与新时代“乡土经验”的重新整合，这便是他在现阶段农村变革视域下，冲破乡土创作桎梏与樊篱的灵性思索。